

记右玉县出土的胡傅温酒樽

□ 李 晨

汉代被称为“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后闪光点”。尽管当时儒家与经学重“礼”的思想十分盛行,但商周青铜的尚鬼、森严、犷厉而又繁富细致的风格还是逐渐被相对注重人性、自然、写实的质朴艺术风格所取代。因此,铜器到了汉代摆脱了礼器程式化的威严神秘,转而向返璞归真的实用器型发展。同时,制作特点也不如商、周、战国时期的多饰以花纹,而以素器最为流行。或仅有简练的弦文,或仅饰以铺首。而上流社会使用的器具仍比较华贵,或施以鎏金,或装饰以金银错^[1]。陈设于山西博物院“民族熔炉”展厅的这对胡傅温酒樽,便是汉代鎏金铜器的精品。

樽,盛酒器。《玉篇·木部》:“樽,酒器也。”《易·坎》:“樽酒簋贰,用缶。”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三年》:“臧孙命北面重席,新樽絜之。”唐李白《前有樽酒行》之一:“春风东来忽相遇,金樽绿酒生微波。”酒樽,作为一种盛酒器,最早见于战国时期。到了汉代,酒樽更为盛行,其用途也更为广泛,可用来温酒或保持酒香。汉代以后,樽、杓作为配套的酒器,一直通行于世,至唐代有了酒注子之后,樽杓才逐渐淡出。

1962年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胡傅温酒樽,共两件,完全相同。器物高24.5厘米,口径23.4厘米,壁厚0.4厘米(图一)。形状为圆筒形,通体鎏金,盖中央有一提环,环外圈分列三个凤形钮。平底,器底三个熊形足,足腹两侧设铺首衔环。通体鎏金浮雕纹饰,盖顶柿蒂纹,围以虎、熊等动物纹,外圈龙纹。腹中部凸饰一宽带,上有弦纹一道。器腹纹饰分上下层,饰有虎、熊、牛、羊、骆驼、鹿、猴、龙、凤、狐等。口沿阴刻铭文“中陵胡傅铜温酒樽,重廿四斤,河平三年造。”另一件铭文后多一“二”字。“河平”为汉成帝年号,河平三年即公元前26年。西汉时一斤约等于250克,“廿四斤”即6公斤左右。这对酒樽是

研究汉代铜器铸造、量器制度、酿酒设备、鎏金工艺及美术史的珍贵实物资料。

右玉县地处晋北(杀虎口在其西北35公里处),与内蒙古大草原和大同云冈相邻,汉代这里正是匈奴与汉族杂居的区域。从器型上看,这对酒樽也属于典型的中原风格,外壁装饰着生动的浮雕动物纹样。通体鎏金,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文化风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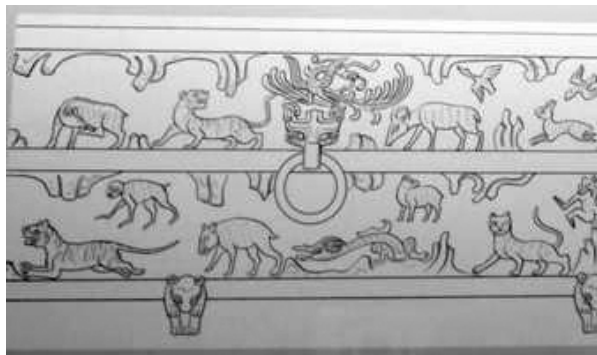
这对胡傅酒樽不但通体鎏金,而且在盖内还残存有少量彩绘鸟兽纹,上面有一层朱漆。金色的富丽堂皇,陪衬以轮廓鲜明的动物形象,敦实典雅的中原器形与活泼奔放的草原装饰浑然一体。

厚实的铜胎外满饰虎、羊、牛、猴等动物,是以减地较深、圆润有力的浮雕刻模法铸成。这种花纹布局法,有异常引人注目的魅力。首先对不同的鸟兽分别描写其神情动态,它们或悠然自得,或惊慌奔跑,显得分外惹人入情(图二)。

如器壁上层构图中有猛虎追羊:虎颈短、尾长、脚矮。用的是有力的长线,特别夸张虎的背脊轮廓线。也特别夸张四条腿的姿势与线条。每一根线条



图一 胡傅温酒樽



图二 胡傅温酒樽动物纹饰

的运用非常沉着,不尚虚浮。且图案以侧面形出现,强调它四条有力的腿,迈开大步,做所谓“虎步”的姿势。另外强调它的尾巴以助“虎威”。羊在惊慌中奔逃,就连旁边的小兽们也显出惊悸神色,营造紧张的气氛。而更多的动物们则表现出悠闲平静的状态:一虎回首顾盼,小鹿翘蹄,猿猴跳跃,背有鬃毛的小兽捕捉鸭鹅的姿势也显得轻松优雅。

此外,纹饰中其他的动物形象在古代也有不同的吉祥含意,比如:

鹿:“牡麋,牝麋,其子麋,其迹速,绝有力”(《尔雅·释兽》)。寓意灵巧而有力。

凤:“凤皇于飞,翺翺其羽,亦集爰止。蔼蔼王多吉士,维君子使,媚于天子。”(《诗经·雅·卷阿》)凤鸟的周围刻有各种飞禽表示天子多有贤人的辅佐,得以江山永固。

牛、羊、骆驼: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以牛羊为财富的主要象征。而双峰驼图案的出现则是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贸易往来频繁的例证。据袁靖《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新发现与新进展》^[2]一文中分析,早在汉昭帝时期即公元前74年之前,西安一带已有骆驼的足迹。

兔:“其迹速,绝有力”(《尔雅·释兽》);猴:“獠猿,善援。蒙頔,獠状”(《尔雅·释兽》)“毋教獠升木,如涂涂附”(《诗经·颂·角弓》)。这些动物均有积极向上,充满生命活力的寓意。

熊:“黑,如熊,黄白文。”“魁,如小熊,窃毛而黄。”(《尔雅·释兽》)“维熊维黑,男子之祥”(《诗经·雅·斯干》)。古人认为,如果梦到熊,象征生的儿子像熊一样有力量,是大吉之兆。

而九尾狐图案的出现则为这件汉代铜器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。

古人历来喜饮温酒,考古发现中有许多此类文

物。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件蜀郡西工造附承盘的东汉铜甗斛,造型与胡傅简形樽非常相似,通体鎏金,虽器表面平素无纹亦光彩夺目^[3]。由此可见,两汉魏晋时期饮用温酒成为时尚。晋左思《魏都赋》:“冻醴流渐,温酎跃波。”温酎,指温热的酒。三国时还有关公“温酒斩华雄”的故事。在汉代,人们饮酒一般是席地而坐,酒樽放置在席中间,里面放着挹酒的杓,故樽形体大多较矮胖,且有三足使器底与地表隔开,起到隔温的作用。

“胡傅温酒樽”的出土,说明可能在汉代以前的人们就喜欢将酒加热后再饮用。有学者曾认为,温酒樽是在樽下加炭火温酒之器。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这是一种保存一种醇香的酒的器具,因为厚重的器盖可以有效地防止气味的挥发。樽是盛酒用的,并非温器。右玉温酒樽虽有三蹄足,然而极矮,其下难以燃火,不能用于加温。而且此型酒樽中有漆器,也有平底无足的陶瓷器,显然并非用于加热。

另有学者认为,“温”可作为“醞”的借字。唐兰先生以为温酒即醞酒,“是反复重酿多次的酒”。由于醞酒使用连续投料法重酿而成,酿造过程时间较长,淀粉的糖化和酒化较充分,故酒液清醇,酒味醇冽^[4]。这种器形恰恰符合了珍藏陈年佳酿的条件:厚壁、密封,且利于沉淀。

[1]田自秉《中国工艺美术史》,知识出版社,1994年版,第119页。

[2]《考古》2004年第7期。

[3]李松、贺西林《中国古代青铜艺术》,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,第171页。

[4]李发林《战国秦汉考古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。

(作者系山西大学音乐美术学院艺术学研究生)